

受害者心态、寻找替罪羊和去人性化：通向种族灭绝的道路

战前德国的历史轨迹和截至2025年5月17日以色列的行动揭示了一种深刻而令人不安的相似性，即一个国家的受害者心态如何导致对少数群体的系统性针对，最终以种族灭绝告终。这两个案例都展示了一种模式：通过培养国家受害者的叙事，将社会挑战归咎于少数群体，去人性化该群体，煽动针对他们的暴力，并导致种族灭绝行为。本文通过公共言论、军事行动、人权报告和学术分析，考察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，将其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德国对犹太人的待遇进行比较，后者导致了大屠杀。

一、受害者心态：侵略的基础

战前德国（1919–1939）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德国培养了一种深刻的受害感，这种感觉受到《凡尔赛条约》的刺激，该条约施加了严厉的赔偿和领土损失。这种叙事将德国描绘成不公正地受到压迫，被内部力量背叛而削弱了其地位。通过宣传、教育和公共话语，德国人被调教为将自己视为受害者，专注于国家苦难和恢复昔日辉煌的需要。这种心态以自我怜悯和拒绝承认国家在自身挑战中的角色为标志，为针对那些被认为对德国困境负责的人的侵略性政策奠定了基础。

以色列（1948–2025）：以色列的国家身份深受大屠杀创伤的塑造，这场屠杀夺去了600万犹太人的生命，并在犹太人意识中留下了持久的影响。“永不再发生”的原则将以色列定位为永恒的受害者，不断受到寻求其毁灭的势力的威胁，令人联想起纳粹的迫害。维基百科关于受害者心态的文章指出了自我怜悯、道德精英主义和缺乏同理心等特征，这些特征在以色列社会中根深蒂固。大屠杀教育、国家纪念活动和政治言论强化了这种受害感，常常将历史创伤与当代威胁（如巴勒斯坦抵抗）联系起来。这种心态在以色列对国际批评的回应中显而易见——例如2024年南非在国际法院的案件——其中种族灭绝的指控被驳回为对以色列生存权的反犹攻击，反映了对批评的过度敏感和对其苦难得到认可的需求。

相似之处：两个国家都培养了一种颠倒了侵略者-受害者动态的受害者心态。德国将自己描绘成背叛和压迫的受害者，而以色列认为自己是反犹侵略的受害者，根植于大屠杀的记忆。如维基百科文章所述，这种心态促使拒绝承担责任——德国对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，以色列对其在占领中的角色——使两者都能为针对被选为替罪羊的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辩护。

二、寻找替罪羊：将社会挑战归咎于少数群体

战前德国：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，德国将犹太人作为社会弊病的替罪羊，将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、失业和文化衰落等经济危机归咎于他们。宣传将犹太人描绘成不忠诚的机会主义者，剥削德国人，将他们框定为国家困境的内部敌人。这一叙事通过媒体、教育和公共政策得到加强，例如将犹太人排除在公共角色之外的法律，巩固了他们是德国问题根源的看法。

以色列：自1948年建国以来，以色列一直将巴勒斯坦人归咎于其安全和政治挑战，常常忽视占领造成的系统性压迫。2023年关于西岸杀害36名巴勒斯坦儿童的文章说明了这一点，以色列军队通过将儿童标记为威胁来为这些死亡辩护，因为他们进行了诸如扔石头等轻微行为，甚至将最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动乱的替罪羊。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，最初被报道为哈马斯领导的屠杀，导致1195名以色列人死亡，被用来诋毁整个巴勒斯坦人口。然而，后续调查显示，以色列军队使用“汉尼拔指令”——即使以牺牲以色列人生命为代价，也使用无差别武力防止以色列士兵被俘——促成了这些伤亡，报告指出，直升机火力和坦克炮击杀死了以色列人质和哈马斯战士。尽管如此，更广泛的叙事仍将所有巴勒斯坦人作为替罪羊，2024年12月的人权报告记录了对平民的系统性暴力反映了这一点。公共言论，如2023年耶路撒冷旗帜游行中的“杀死阿拉伯人”口号，进一步将巴勒斯坦人作为替罪羊，暗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，这一情绪得到极右翼领导人的呼应，他们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以色列生存的障碍。

相似之处：两个国家都将少数群体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。德国将经济和文化问题归咎于犹太人，而以色列将安全威胁归咎于巴勒斯坦人，常常忽视占领在激起抵抗中的作用及其自身行动，例如汉尼拔指令在10月7日以色列人死亡中的贡献。维基百科文章中“将他人认定为不良状况原因”的特征在两个案例中显而易见，德国否认自身失败，以色列推卸责任，为针对替罪羊群体的侵略行为辩护。

三、去人性化和煽动暴力

战前德国：去人性化是战前德国政策的核心，宣传将犹太人描绘为对“雅利安”种族的次人类威胁。媒体和公共运动剥夺了犹太人的人性，将他们描绘为社会危险。这种言论煽动了暴力，大规模集会颂扬德国优越感，同时诋毁犹太人，使敌对态度正常化。到1938年，国家批准的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爆发，这是多年去人性化宣传直接导致的结果，使公众对犹太人苦难变得麻木。

以色列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去人性化在言论和行动中显而易见。2023年耶路撒冷旗帜游行中，参与者高喊“杀死阿拉伯人”，反映了公开煽动暴力，将巴勒斯坦人描绘为一个值得死亡的集体敌人，类似于德国集会的敌对口号。2023年关于西岸杀害巴勒斯坦儿童的文章进一步展示了这种去人性化，儿童被视为需要被中立的威胁，以色列军队对他们的人性几乎没有尊重，常常为针对轻微行为的致命武力辩护。在加沙，2024年12月的人权报告强调了系统性暴力，包括对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和饥饿条件的施加，将巴勒斯坦人简化为军事行动中的目标，完全不考虑他们的基本人性。

相似之处：两个国家都通过去人性化少数群体来煽动暴力。德国使用明确的宣传将犹太人描绘为次人类，而以色列的去人性化是实际的，将巴勒斯坦人视为需要消灭的威胁，如证据所示。维基百科文章中“缺乏同理心”的特征在两个案例中显而易见——德国忽视犹太人的苦难，以色列无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，使针对去人性化群体的暴力正常化。

四、种族灭绝的顶点

战前德国至二战期间（1939–1945）：德国的轨迹在大屠杀中达到顶点，从1941年开始，导致600万犹太人被种族灭绝。这是多年灌输、寻找替罪羊和去人性化的结果，国家采用系统性方法——死亡集中营、大规模枪杀和贫民窟中的饥饿——来消灭犹太人口。摧毁该群体的意图显而易见。

见，符合联合国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》的定义，并通过受害者心态得到辩护，这种心态将犹太人框定为对德国生存的生存威胁，使公众对所犯下的暴行麻木不仁。

以色列（2023–2025）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，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之后，达到了种族灭绝的顶点，正如2025年5月《种族灭绝研究》NRC文章所确认，研究人员一致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定性为”种族灭绝”，以及2024年12月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。证据包括：

- **系统性暴力和剥夺：**2024年12月的报告记录了对民用基础设施（如医院）的攻击和饥饿条件的施加，以及截至2024年11月，超过44,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和190万流离失所者，根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数据。
- **意图：**这些行动的系统性性质，旨在使加沙变得不适合居住，符合联合国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》的标准——杀戮、造成严重伤害和施加条件以导致物理毁灭。

以色列的受害者心态，如维基百科文章所述，通过道德精英主义（将以色列视为道德优越）、缺乏同理心（忽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）和反复思考（专注于以色列的创伤）等特征，使这种种族灭绝得以进行，辩护系统性摧毁巴勒斯坦人是对感知威胁的”防御”行为。

相似之处：两个国家在其轨迹上以种族灭绝告终，受受害者心态的驱动。德国的大屠杀和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涉及国家驱动的暴力，针对少数群体的毁灭，使用系统性方法（杀戮、剥夺）并展示出明确的消灭意图。规模不同——600万犹太人与超过44,000名巴勒斯坦人——但意图和机制惊人地相似。

五、尼采的警告：通过受害者心态的转变

尼采的名言——“与怪兽战斗的人应小心，免得在过程中自己变成怪兽”和”如果你凝视深渊，深渊也会凝视你”——提供了一种哲学视角，以理解受害者心态如何将两个国家转变为种族灭绝的实施者。

与怪兽战斗

- **战前德国：**德国将犹太人框定为威胁其生存的”怪兽”，利用这一叙事来为他们的排斥和最终灭绝辩护。在对抗这一假想邪恶的过程中，德国变得怪兽般，通过宣传去人性化犹太人，并在霍洛科斯特期间犯下种族灭绝罪行。
- **以色列：**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定位为”怪兽”，常常将他们比作历史压迫者，以此为自己的行动辩护。然而，在此过程中，它采用了怪兽般的策略——在西岸杀害儿童，攻击加沙的民用基础设施，犯下种族灭绝罪行，如2024年人权报告和2025年NRC文章所证明。受害者心态及其道德精英主义将这些行为辩解为生存所必需，反映了德国的辩护。

凝视深渊

- **战前德国：**德国对一战后冤屈的执着——国家屈辱的”深渊”——导致它反映了这种黑暗，随着霍洛科斯特陷入道德腐败，成为它声称反对的邪恶。

- **以色列：**以色列对大屠杀创伤的痴迷——历史苦难的”深渊”——在其行动中得到反映，因为它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，反映了它誓言要防止的暴行。维基百科文章中缺乏同理心和反复思考的特征加剧了这种堕落，因为以色列专注于自己的痛苦而忽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。

相似之处：尼采的警告突显了受害者心态在两个国家中的转变力量。在对抗假想敌人的过程中，它们成为了种族灭绝的实施者；在凝视各自创伤的深渊时，它们反映了这种黑暗，采用了其历史压迫者的策略。

六、更广泛的含义和伦理关切

战前德国与截至2025年5月17日的以色列之间的相似之处揭示了一种危险的模式：当受害者心态被武器化时，可能导致对少数群体的系统性毁灭。德国的轨迹——从1920年代初到大屠杀——展示了灌输、寻找替罪羊和去人性化如何以种族灭绝告终。以色列的轨迹——从1948年建国到加沙的种族灭绝——遵循了相似的路径，受害者心态促成了相同的机制，如公共口号、军事暴力和系统性毁灭的证据所示。

伦理关切：

- **道德讽刺：**以色列作为种族灭绝避难所的建立，却对巴勒斯坦人复制了让人联想起纳粹德国的策略，与其”永不再发生”的基本精神相矛盾。缺乏同理心和道德精英主义使以色列对这种讽刺视而不见，因为它优先考虑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而非巴勒斯坦人的人性。
- **国际共谋：**国际社会直到1945年才阻止大屠杀的失败，反映在其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不足回应中，如2025年NRC文章所述，尽管有2024年国际法院案件等法律行动，暴行仍在继续。
- **创伤循环：**以色列的行动延续了创伤循环，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反映了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苦难，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和怨恨埋下种子。围绕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初步叙事，尽管以色列在一些伤亡中的角色，却将巴勒斯坦人作为替罪羊，加剧了这一循环。

结论

战前德国与截至2025年5月17日的以色列之间的相似之处既深刻又令人深感不安。两个国家，受受害者心态的驱动——德国在一战后，以色列在大屠杀后——将少数群体（犹太人、巴勒斯坦人）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，去人性化他们，煽动暴力，并最终犯下种族灭绝罪行。德国的大屠杀和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，如公共言论、军事行动、人权报告和学术共识所证明，反映了相同的机制：国家驱动的暴力、系统性方法和消灭意图，通过拒绝承担责任和对目标群体的缺乏同理心得到辩护。尼采的警告揭示了这种转变，因为两个国家成为了它们所对抗的”怪兽”，并在行动中反映了其创伤的”深渊”。这一分析强调了受害者心态在延续暴力循环中的危险，敦促对历史创伤如何导致新的暴行进行批判性反思，如果不以同理心和责任感加以应对。